

# 购买社会保险能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吗？\*

## ——基于上海市 2942 个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

程名望 华汉阳

**摘要:**本研究采用 2016~2018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的 2942 份农民工样本数据,利用有序 Probit 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购买社会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且购买的社会保险种类越多,其主观幸福感越高。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比未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高 21.70%,每多购买一种社会保险,其主观幸福感提高 6.10%。五种类型的社会保险均能显著提高参保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其中购买医疗保险带来的边际效应最高,其次为养老保险,最低的是工伤保险。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分样本分析,发现原模型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社会保险 农民工 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 F016 F328 **文献标识码:** A

### 一、引言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核心目标。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成功从“低收入国家”跨越到“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国民幸福感提升速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中国遭遇了“幸福悖论”(Easterlin et al., 2012)。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民幸福感问题,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农民工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已有研究表明,1978~2015 年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非农业部门产出贡献率达到 11.64%,社会总产出贡献率为 10.21%(程名望等, 2018)。另外,2018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工数量已达 28836 万人,比 2017 年增长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与政策研究”(编号: 15JZD02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户贫困根源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编号: 71873095)及“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机理及影响因素研究”(编号: 71673200)的资助。笔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中肯意见,感谢编辑部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同时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 华汉阳。

0.60%，其中外出农民工 17266 万人，比上年增长 0.50%<sup>①</sup>。因此，研究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问题，不仅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事实上，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任何的产业结构调整都可能对农民工群体的工作和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会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的挑战。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防范风险的作用，理论上可以增强农民工的安全感，从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但就实际情况看，农民工是否能够参加社会保险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农民工多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工作，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用人单位为了节约成本，往往不愿意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另一方面，农民工由于收入过低不愿意或者无法支付保费，也担心参保后不能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保障（李亚青等，2012）。因此，社会保险是否能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的 2942 个样本数据，研究购买社会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考察不同类型社会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及其差异，期望能够发现更加有效地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方法，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和推进城镇化进程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 二、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幸福”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等哲学家对幸福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伊壁鸠鲁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幸福思想，他认为快乐增长的上限是所有痛苦的除去，快乐的生活离不开理智、美好和正义，最幸福的生活是受德性指导、符合德性要求的，这种幸福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幸福（张映芹、魏鹏，2010）。虽然人类很早就开始对“幸福”进行研究，但到目前为止，“幸福”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正如 Waterman（1993）所言：“‘幸福’是一个每个人都知道其含义但无人可以精确定义的词语。”而在学术界，人们常使用主观幸福感来度量个体的幸福程度，认为主观幸福感可以反映人们对生活整体的主观评价（Diener，1984；冯诗杰等，2014）。事实上，早期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直到 Easterlin（1974）在其开创性研究中发现了“幸福悖论”，大量经济学家才开始了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学领域中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快速涌现，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重视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其中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考察。从微观层面来看，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是收入和就业。尽管不同学者对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持有不同的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收入的确可以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Clark et al.，2008；罗楚亮，2009）；失业状况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有明显的负面

<sup>①</sup>参见国家统计局：《2018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zjtc/qjd/tjdt/201904/t20190429\\_1662313.html](http://www.stats.gov.cn/zjtc/qjd/tjdt/201904/t20190429_1662313.html)。

作用 (Frey and Stutzer, 2002);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等也会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Oswald, 1997; Blanchflower and Oswald, 2001; 元寿伟、周少甫, 2010)。从宏观层面来看, 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增长、失业率、通货膨胀、环境污染、财政支出等 (Easterlin, 1974; Tella et al., 2001; Knight et al., 2009; Mackerron and Mourato, 2009; 胡洪曙、鲁元平, 2012)。

同时, 一些学者已经发现社会保险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影响, 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从现有文献看, 社会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种机制。一方面, 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有着天然的风险抵御功能, 可以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这是因为居民往往采用预防性储蓄来规避风险, 而预防性储蓄会挤占居民的当期消费, 当期消费的降低会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 (张子豪、谭燕芝, 2018)。另一方面, 社会保险作为一种典型的收入再分配手段, 肩负着政府分配职能。在社会总财富一定的情况下, 社会保险覆盖面越广表明政府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越强, 政府投入社会保险基金的财政收入所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越大意味着居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得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就越低, 这样会降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Bjornskov et al., 2007)。尽管社会保险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较为复杂, 需要考虑筹资模式、资金来源、责任分担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但如果制度设计合理, 社会保险就可以有效地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王延中等, 2016), 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以上文献和理论分析较全面地研究了社会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但关注的群体主要是城镇居民, 鲜有关于社会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在已涉及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零星研究中, 学者们主要从其他角度考察了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例如, 祝仲坤和冷晨昕 (2017) 发现居住模式和住房类型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其中分散居住和集中居住的农民工比住在临时住所的农民工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随后研究又发现迁移行为也会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造成显著影响, 其中, 相比较于省内迁移, 跨省迁移会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 相比较于家庭化迁移, 孤身外出会弱化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 (祝仲坤等, 2019)。刘靖等人 (2013) 研究了权益保障对农民工在打工所在地幸福感的影响。盛光华和张天舒 (2015) 利用 2009 年的 CHIP 数据, 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就业状态、工作合同性质、工作时间、工作餐福利和保险水平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基于社会保险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以及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现状, 本研究提出假说 1, 如下:

假说 1: 购买社会保险可以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

此外, 由于不同类型社会保险抵御风险的能力和作用机制的差异, 不同类型社会保险对参保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具体而言, 个体的健康风险作为生活中最常见的风险, 直接关系到个体的生命, 医疗保险作为能够有效降低健康风险所带来损失的手段, 可以对未来发生的风险提供一定的金钱补偿, 提高参保个体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从而有效提高参保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养老保险可以使参保个体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按月领取一定数额的养老金, 这样就降低了参保个体的自我养老储蓄, 提高参保个体的当期消费, 从而提高了其主观幸福感; 参加失业保险可以降低失业对参保个体当期消费的冲击, 起到缓冲作用, 维持参保个体现有的主观幸福感, 另外失业保险还可以降低参保个体

对失业的恐惧心理，使其失业情况有更加积极的改善，增强其主观幸福感；生育保险可以缓解因为生育孩子而给家庭所带来的激增的消费压力，维持其现期的主观幸福感；参加工伤保险可以让参保个体减轻对发生工伤事故后所需大额费用的焦虑，从而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形成积极影响。

在实证研究方面，李后建（2014）基于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确定性防范措施对城市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参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城市务工人员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而参与医疗保险的城市务工人员并没有获得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张子豪和谭燕芝（2018）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也研究了不同社会保险项目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虽然参加任意种类的社会保险项目都能提升国民幸福感，但不同种类社会保险项目对国民幸福感的提升效果不同，其中最高的是工伤保险，其次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与生育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提升效果相对较小。以上研究基于不同的数据、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得出的各类型社会保险对参保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所不同，但考虑到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是中国社会保险保障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医疗保险参保率和养老保险参保率要高于其他三种社会保险的参保率<sup>①</sup>，理论上说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影响会更大，因此，本研究基于以上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提出假说2，如下：

假说2：与其他社会保险相比，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采用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项调查的调查对象为在上海务工超过6个月的农民工。调查采用入户问卷的形式，其中问卷共分为9个部分，分别为农民工及随迁家属基本情况、就业、健康与医疗、居住条件、社会融合状况、未随迁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子女教育、农民工及共同居住家庭成员的收支情况以及农民工在城镇的定居意愿。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分别获得与本研究相关的样本1246份、1245份和1245份，共计3736份。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本研究首先选取了工资性就业者（雇员）样本，然后在删除部分变量值缺失和少数明显错误而又无法修正的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2942份。

就采用的样本看，样本农民工中男性比例为61.69%，高于女性占比；平均年龄为36.57岁，其中最大年龄为69岁，最小年龄为17岁，年龄分布的标准差较大，呈分散性特征；受教育程度平均为8.58年，呈现以初中教育为中心的正态分布状；75.30%的农民工有配偶；98.40%的农民工身体状况为健康；就就业时间看，样本农民工的周工作时间为51.53小时，远远超过法定周最长工作时间（44个小时）；就收入看，样本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5555.52元，其中最高月收入为40400元，最低仅为1260元。

就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变量看，一是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分布如图1所示，分析可见，7.48%的

<sup>①</sup>参见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

农民工感觉非常幸福，46.13%的农民工感觉比较幸福，40.86%的农民工感觉一般，还有5.17%和0.37%的农民工感觉不太幸福和感觉非常不幸福。归纳来看，明确表示感到幸福的农民工比例占53.61%，明确感到不幸福的比例仅为5.54%。二是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参保情况。分布如图2所示，分析可见，样本农民工中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最高，为67.71%，其次为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为66.38%，而参加生育保险的比例最低，为43.98%，还有57.27%和65.36%的农民工参加了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总体来说，农民工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的比例都不是很高，但与已有研究的发现相比（李亚青等，2012），已经有较大幅度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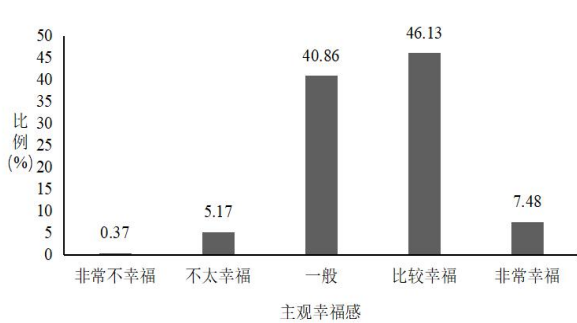


图1 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情况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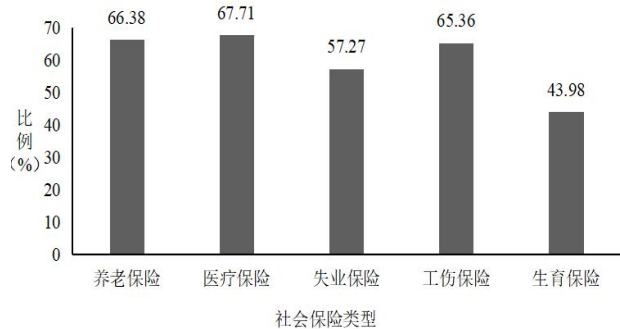


图2 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情况分布

## (二) 变量选取

就被解释变量看，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己生活状态的主观评价，目前测量主观幸福感一般采取自陈量表，即受访者自我汇报其对生活的满足感受，以此反映其幸福感。例如，著名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就是通过设计一个问题来测量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问题是“总的来说，您觉得幸福吗？”，答案有“非常幸福”“幸福”“不是很幸福”和“一点也不幸福”四个选项。尽管该办法相对简单，但已有研究表明该办法测量出的指标在可比性和有效性上都具有很高的效度和信度，可以准确地表达个人的真实感受(Veenhoven, 1996; Easterlin, 2003; Graham and Pettinato, 2010)。基于此，本研究采用问卷中的问题“您对生活状况是否满意？”，并根据Likert五分量表，把“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分别赋值为1~5。需要说明的是，使用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替代变量，符合众多学者的做法，例如Easterlin(2012)在研究1990~2010年中国国民主观幸福感变化时，就曾直接利用生活满意度代替主观幸福感，周绍杰等(2015)在研究中国国民幸福感时，也曾直接利用中国民生指数调查数据中的生活满意度指标来表示主观幸福感，Veenhoven(1996)也曾专门研究过满意度和幸福感在不同语言中由于含义不同是否会造成个人幸福感指标的测量差异，通过对双语国家的人分别用满意度和幸福感作为术语提问发现，得到的幸福指标结果几乎完全一样，故而认为主观幸福感等同于生活满意度。

就核心解释变量看，Rofman et al.(2006)认为可以从覆盖面、全面性和可持续性这三个方面来评价社会保险，其中覆盖面表现为农民工是否参加了社会保险，全面性表现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种类是否全面，而可持续性涉及社会保险的宏观层面。本研究借鉴张子豪和谭燕芝(2018)的做法，选

择覆盖面和全面性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状况。在本调查中，受访者被问及“单位或雇主是否为您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或雇主是否为您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或雇主是否为您上失业保险？”“单位或雇主是否为您上生育保险？”和“单位或雇主是否为您上工伤保险？”这五个问题，回答选项均为“是”“否”和“不知道”，回答“是”说明参加了某一类社会保险，赋值为“1”，其他回答均被视为没有参加该类社会保险，赋值为“0”。若农民工参加了上述任一种类的社会保险则被视为被社会保险所覆盖，设置变量“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具体见表1。另外，通过累加农民工样本参加社会保险的种类来衡量社会保险的全面性，设置变量“参加社会保险的种类”，变量值为整数0~5。同时，为了更加准确地度量社会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避免发生遗漏变量的问题，根据已有研究，本研究设置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周工作时间、月收入的对数等，具体如表1所示。其中，年龄的平方项主要是为了考察年龄可能带来的非线性影响。

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i>Subjective Well-being</i>	主观幸福感，英文简称SWB，为序数	3.552	0.723	1	5
核心解释变量	<i>Coverage</i>	是否参加社会保险（覆盖面），是=1，否则=0	0.732	0.443	0	1
	<i>Comprehensiveness</i>	参加社会保险的种类（全面性），为基数0~5	3.007	2.114	0	5
	<i>Medicare</i>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是=1，否则=0	0.677	0.468	0	1
	<i>Endowment</i>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1，否则=0	0.664	0.472	0	1
	<i>Unemployment</i>	是否参加失业保险，是=1，否则=0	0.573	0.495	0	1
	<i>Maternity</i>	是否参加生育保险，是=1，否则=0	0.440	0.496	0	1
	<i>Injury</i>	是否参加工伤保险，是=1，否则=0	0.654	0.476	0	1
控制变量	<i>Gender</i>	性别，男=1，女=0	0.617	0.486	0	1
	<i>Age</i>	年龄	36.575	10.475	17	69
	<i>Age<sup>2</sup></i>	年龄的平方/100	14.474	8.218	2.89	4.76
	<i>Education</i>	受教育程度	3.570	1.009	1	5
	<i>Marriage</i>	婚姻状况，有配偶=1，否则=0	0.753	0.431	0	1
	<i>Health</i>	身体状况	4.973	0.239	2	5
	<i>Work_time</i>	周工作时间（小时数）	51.531	12.782	1	112

<i>Ln_income</i>	月收入的对数	8.551	0.367	7.139	10.607
------------------	--------	-------	-------	-------	--------

注：①样本数 2942 个；②非常幸福=5、比较幸福=4、一般=3、不太幸福=2、非常不幸福=1；③在“是否参加社会保险”的回答中，回答“否”和“不知道”均赋值为 0；④医疗保险特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特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⑤受教育程度中，文盲=1、小学=2、初中=3、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4、大专/大学/研究生=5；⑥婚姻状况中其他包括未婚，离婚和丧偶；⑦健康状况中，健康=5、体质较弱=4、身有残疾=3、患有慢性病=2、患有大病=1；⑧周工作时间=周工作天数×日工作小时数；⑨月收入=现金收入+折算的房补+折算的食补，单位：元。

#### 四、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典型的离散有序变量，因此选择有序 Probit 模型 (Ordered Probit Model, Oprobit)，根据上文的数据说明和变量选取，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Probit(SWB_{it}^*) = \alpha + \beta Insurance_{it} + \lambda CV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在 (1) 式中， $SWB_{it}^*$  表示第  $t$  年第  $i$  个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 $Insurance_{it}$  为与社会保险相关的核心解释变量， $CV_{it}$  为控制变量矩阵，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alpha$ 、 $\beta$  和  $\lambda$  为待估参数。

采用 Stata/MP14.0 的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从模型 1 的实证结果可知，购买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购买了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比未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高 21.70%，该结果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验证了假说 1，即购买社会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从模型 2 的实证结果可知，社会保险的全面性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也存在正向影响，其边际效应为 6.10%，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综合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购买社会保险能够有效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并且社会保险的全面性越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越高。这一结果比张子豪和谭燕芝（2018）测算的社会保险覆盖面和全面性对中国国民幸福感的边际效应值都要高，其测算的边际效应值分别为 10.10% 和 3.60%。

表 2 社会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i>Subjective Well-being</i>						
	ME1	ME2	ME3	ME4	ME5	ME6	ME7
<i>Coverage</i>	0.217*** (0.049)						
<i>Comprehensiveness</i>		0.061*** (0.011)					
<i>Medicare</i>			0.260*** (0.048)				
<i>Endowment</i>				0.234*** (0.048)			
<i>Unemployment</i>					0.213*** (0.046)		

购买社会保险能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吗？

<i>Maternity</i>						0.213*** (0.045)	
<i>Injury</i>							0.192*** (0.046)
<i>Gender</i>	-0.002 (0.045)	0.010 (0.045)	0.006 (0.045)	0.008 (0.045)	0.008 (0.045)	0.034 (0.045)	-0.002 (0.045)
<i>Age</i>	-0.042*** (0.016)	-0.043*** (0.016)	-0.044*** (0.016)	-0.043*** (0.016)	-0.038** (0.016)	-0.037** (0.016)	-0.040** (0.016)
<i>Age<sup>2</sup></i>	0.062*** (0.020)	0.064*** (0.020)	0.066*** (0.020)	0.064*** (0.020)	0.058*** (0.020)	0.057*** (0.020)	0.059*** (0.020)
<i>Education</i>	0.027 (0.028)	0.009 (0.028)	0.0173 (0.028)	0.020 (0.027)	0.017 (0.028)	0.017 (0.028)	0.028 (0.028)
<i>Marriage</i>	0.196*** (0.057)	0.184*** (0.057)	0.192*** (0.057)	0.196*** (0.057)	0.194*** (0.056)	0.192*** (0.057)	0.190*** (0.057)
<i>Health</i>	0.221*** (0.081)	0.217*** (0.081)	0.220*** (0.080)	0.223*** (0.081)	0.218*** (0.082)	0.224*** (0.083)	0.220*** (0.082)
<i>Work_time</i>	-0.008*** (0.002)	-0.007*** (0.002)	-0.008*** (0.002)	-0.008*** (0.002)	-0.008*** (0.002)	-0.008*** (0.002)	-0.008*** (0.002)
<i>Ln_income</i>	0.546*** (0.065)	0.561*** (0.065)	0.566*** (0.065)	0.572*** (0.065)	0.566*** (0.065)	0.564*** (0.065)	0.540*** (0.066)
<i>N</i>	2942	2942	2942	2942	2942	2942	2942
<i>Pseudo R<sup>2</sup></i>	0.031	0.032	0.032	0.031	0.031	0.031	0.030

注：①\*\*\*、\*\*、\*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③由于篇幅限制，表中未汇报 4 个切点值的估计值及其稳健标准误，4 个切点值的估计值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另外，由表 2 中模型 3 至模型 7 的实证分析结果可知，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中任一种类的社会保险都可以提高其主观幸福感，且都在 1%的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参与医疗保险给农民工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最高，为 26.00%；其次为养老保险，为 23.40%；而边际效应最低的是工伤保险，为 19.20%。以上结果也验证了假说 2，即与其他社会保险相比，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不同种类社会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边际效应存在差异是因为不同种类社会保险在农民工群体中发挥作用的概率不同。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边际效应较高是因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是处于核心地位，几乎每个社会保险参保个体都会享受这两种社会保险带来的福利，其次是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而工伤保险的边际效应最低是因为工伤保险在农民工的整个劳动周期中出现的概率最低，因此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最小。

在控制变量方面，性别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杨胜利等人（2016）的研究结果一致；农民工的年龄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呈“U”型关系，即先随年龄的增长，其主观幸福感不断下降，达到一个



临界年龄后，其主观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在不断提高。基本的解释是年轻人生活压力较小，主观幸福感较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到中年后逐渐面临的更多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主观幸福感降到最低；而随着年龄的继续增长到了老年阶段，人们的生活会更加安稳，人们也常常知足常乐，因此主观幸福感也较高，这也与李后建（2014）、杨胜利等（2016）以及张子豪和谭燕芝（2018）的研究结果一致。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有配偶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明显比没有配偶的农民工高，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很好地体现了“婚姻溢价”效应，有配偶的农民工通过家庭分工，提高了家庭的总产出，也提升了其主观幸福感。农民工个体的健康状况对其主观幸福感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是因为健康的身体才是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物质载体（Perneger et al., 2004）。工作时间越长，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越低，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工作时间越长意味着闲暇时间越短，故会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月收入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十分显著，且影响较大，月收入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增加 50% 以上，这是因为目前中国尚为发展中国家，还尚未全面实现小康，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还相对较低，物质水平的改善仍然是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Knight et al., 2009）。

## 五、进一步的稳健性分析

### （一）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分析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购买社会保险可以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但由于数据和变量的限制，可能会出现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例如社会保险会影响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但也可能存在某些农民工认为拥有某种社会保险会带来幸福感才选择去购买，出现“自选择”问题。因此，为了降低样本选择偏差以及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研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构造社会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反事实框架，对上文的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和修正。

PSM 构建反事实框架的思想是把样本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首先根据协变量计算样本的倾向得分，其中被广泛使用的方法是 Logit 回归，然后根据倾向得分将实验组和对照组中的样本进行匹配，常使用的匹配方法有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等。另外，使用 PSM 需要对两组样本进行平衡性检验，以确保两组样本除了处理指示变量的差异外，其他的解释变量不存在系统性差异，这样就类似于一个自然实验，能够有效减少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得到更加真实的结果。在本研究中，参与了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样本为实验组，未参与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样本为对照组，处理指示变量为“是否参与社会保险”，本研究使用最近邻匹配法（ $k=1$ ）<sup>①</sup>得到的变量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sup>①</sup>  $k=1$  表示进行一对一匹配。

表3 匹配变量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样本	均值		标准化偏差 (%)	偏差减少 (%)	t 检验	
		实验组	对照组			t	P >  t
Gender	匹配前	0.633	0.575	11.9		2.86	0.004
	匹配后	0.631	0.640	-2.0	83.0	-0.67	0.505
Age	匹配前	35.407	39.766	-39.9		-10.17	0.000
	匹配后	35.415	35.146	2.5	93.8	0.93	0.352
Age <sup>2</sup>	匹配前	13.442	17.296	-44.4		-11.51	0.000
	匹配后	13.454	13.227	2.6	94.1	1.02	0.306
Education	匹配前	3.759	3.052	76.8		17.70	0.000
	匹配后	3.749	3.690	6.4	91.7	2.00	0.045
Marriage	匹配前	0.759	0.737	4.9		1.18	0.236
	匹配后	0.757	0.796	-9.2	-87.0	-3.12	0.002
Health	匹配前	4.981	4.954	10.1		2.63	0.008
	匹配后	4.980	4.977	1.3	87.5	0.54	0.590
Work_time	匹配前	49.955	55.841	-44.7		-11.30	0.000
	匹配后	50.066	49.331	5.6	87.5	1.93	0.054
Ln_income	匹配前	8.587	8.451	37.4		9.03	0.000
	匹配后	8.577	8.550	7.2	80.7	2.45	0.014

分析表3可知，样本在匹配前，除了婚姻状况，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都大于1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进行样本匹配后，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都小于10%，而且大多数t检验的结果都不拒绝实验组与对照组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婚姻状况除外），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化偏差也都大幅度减小。以上结果说明，PSM有效地减少了两组样本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即个体特征差异，符合随机实验的要求。基于匹配后的样本，计算实验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 ATT），其处理效应的表达式为：

$$ATT = E(y_{1i} - y_{0i} | D_i = 1) = \frac{1}{N} \sum_{i: D_i = 1} (y_i - \sum_{j: D_j = 0} w(i, j) y_j) \quad (2)$$

公式(2)中， $D_i$ 为处理变量，反映个体*i*是否参与社会保险， $y_{0i}$ 表示未参与社会保险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y_{1i}$ 表示参与社会保险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N$ 为实验组的个体数， $y_i$ 和 $y_j$ 分别为实验组*i*和对照组*j*的处理结果， $w(i, j)$ 为适应于配对(*i, j*)的权重。

为了更加精确地估计社会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分别使用了最近邻匹配（ $k=1$ 和 $k=4$ ）、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三种方法<sup>①</sup>，表4汇报了最近邻匹配法（ $k=1$ ）的倾向得分匹配结果。从

<sup>①</sup>  $k=4$ 表示进行一对四匹配；由于篇幅所限，文中未汇报其他匹配方法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其他匹配方法的结果均通过平衡性检验）和倾向得分匹配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表 4 结果可以得知，在未匹配时，样本总体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0.199， $t$  值为 6.65，说明在不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比未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高 0.019，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分析样本匹配后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可知，购买社会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通过有序 Probit 模型计算得到的社会保险的幸福效应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同样，在样本匹配前后，参加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农民工样本平均处理效应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购买各类型社会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来看，虽然匹配后样本各变量的平均处理效应与匹配前相比有所下降<sup>①</sup>，但都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上文的回归分析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 4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变量	匹配方法	实验组	对照组	ATT	标准差	$t$ 值
Coverage	未匹配	3.605	3.406	0.199	0.030	6.65***
	最近邻匹配 ( $k=1$ )	3.602	3.346	0.256	0.071	3.63***
Endowment	未匹配	3.608	3.441	0.167	0.0281	5.95***
	最近邻匹配 ( $k=1$ )	3.605	3.469	0.136	0.0625	2.18***
Medicare	未匹配	3.613	3.422	0.191	0.0283	6.76***
	最近邻匹配 ( $k=1$ )	3.611	3.442	0.169	0.0620	2.73***
Unemployment	未匹配	3.621	3.459	0.162	0.0268	6.04***
	最近邻匹配 ( $k=1$ )	3.619	3.484	0.134	0.0509	2.64***
Injury	未匹配	3.617	3.429	0.188	0.0278	6.76***
	最近邻匹配 ( $k=1$ )	3.615	3.496	0.119	0.0497	2.39***
Maternity	未匹配	3.636	3.485	0.151	0.0267	5.64***
	最近邻匹配 ( $k=1$ )	3.638	3.482	0.155	0.0462	3.36***

注：①1 对 1 最近邻匹配进行有放回匹配，仅对共同取值范围内个体进行匹配，且允许并列；②\*\*\*、\*\*、\*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统计水平上显著。

## （二）社会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分样本分析

基于社会保险覆盖面和全面性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可以发现购买社会保险可以有效地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且购买的社会保险种类越多，其主观幸福感越高，但这些结果都是基于总体样本的分析，那么社会保险覆盖面和全面性对不同特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呢？接下来，本研究将关注社会保险覆盖面和全面性对不同特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分样本分析，以下回归分析均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

1. 收入分组分析。本研究将农民工样本根据平均月收入（5555.52 元）的多少划分为高收入组与低

<sup>①</sup> 本研究分别使用最近邻匹配 ( $k=1$  和  $k=4$ )、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三种方法得到了匹配后的样本平均处理效应值，虽然不同匹配方法得到的匹配后样本的平均处理效应值不同，但对于每个变量而言，匹配后样本的平均处理效应值减小得较多，故得出该结论。由于篇幅有限，文中未汇报详细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收入组，其中月收入高于平均月收入的有 1401 人，占比 47.54%，低于或等于平均月收入的有 1541 人，占比 52.46%，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由表 5 中模型 8 与模型 9 的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不论是高收入组还是低收入组，购买社会保险都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但高收入组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的幸福效应比低收入组的高。同样，从模型 10 和模型 11 的实证分析结果可知，社会保险的全面性对高收入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为 0.095，高于低收入组农民工的 0.041，可以看出，收入越高的农民工群体参加社会保险的幸福效应越高。这可能是因为，与低收入群体相比，高收入农民工群体购买社会保险可以补偿更多的风险，不必增加过多的预防性储蓄，其当期消费也会更高，因而其主观幸福感更高。模型 12 和模型 13 的实证结果分别是添加了社会保险覆盖面与收入的交叉项和社会保险全面性与收入的交叉项的结果。结果表明，收入越高的人购买社会保险的幸福效应越高，收入越高的人购买的社会保险种类越多其幸福效应也越高，验证了收入分组结果的可靠性。

表 5 社会保险对不同收入组别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i>Subjective Well-being</i>					
	ME8	ME9	ME10	ME11	ME12	ME13
	低收入组	高收入组	低收入组	高收入组	总体	总体
<i>Coverage</i>	0.206*** (0.0631)	0.239*** (0.0803)				
<i>Comprehensiveness</i>			0.041*** (0.0140)	0.095*** (0.0174)		
<i>Coverage × Ln_income</i>					0.455*** (0.0735)	
<i>Comprehensiveness × Ln_income</i>						0.106*** (0.017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1541	1401	1541	1401	2942	2942
<i>Pseudo R<sup>2</sup></i>	0.0217	0.0144	0.0211	0.0211	0.0250	0.0263

注：①\*\*\*、\*\*、\*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2. 代际分析。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出现了代际交替，截至 2018 年底，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 51.50%，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的比例已经过半。新老农民工由于在教育程度和思想观念方面的不同，在对待同一事物也有可能有着不同的反应。根据是否是“80 后（包括 1980 年出生的个体）”将样本农民工划分为“新生代”和“老一代”两组，其中“新生代”农民工 1663 人，占比 56.45%，“老一代”农民工 1279 人，比例为 43.55%。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新老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的幸福感受证分析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i>Subjective Well-being</i>					
	ME14 新生代	ME15 老一代	ME16 新生代	ME17 老一代	ME18 总体	ME19 总体
<i>Coverage</i>	0.322*** (0.0716)	0.169** (0.0715)				
<i>Comprehensiveness</i>			0.062*** (0.0148)	0.070*** (0.0165)		
<i>Coverage × Age</i>					-0.009** (0.0041)	
<i>Comprehensiveness × Age</i>						0.001*** (0.000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1663	1207	1663	1207	2942	2942
<i>Pseudo R<sup>2</sup></i>	0.0370	0.0353	0.0363	0.0396	0.0312	0.0316

注：①\*\*\*、\*\*、\*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6 可知，社会保险覆盖面和全面性对新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都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具体来看，购买社会保险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边际影响为 0.322，而对老一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边际影响为 0.169。据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参保率为 79.30%，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参保率 65.20%。这是由于社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需要个人支付一定比例，支付社会保险费会降低个人在生活中其他方面的消费水平，导致参保个体当期主观幸福感下降。而在本研究样本中，新生代农民工收入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收入，故社会保险费的支付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要小于老一代农民工。此外，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人生奋斗时期，其在就业和生活上遭遇风险的概率更大，购买社会保险更能降低其未来遭受风险时的损失；而老一代农民工往往外出务工多年，就业和生活也往往更加稳定，发生风险的可能性也更小。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动机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强，其购买社会保险带来的幸福效应也比老一代农民工高。购买社会保险种类的多少对于提高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差别不大，新生代农民工的边际效应为 0.062，老一代农民工的边际效应为 0.070。模型 18 和模型 19 分别添加了社会保险覆盖面和全面性与年龄的交叉项，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年龄越大其参加社会保险的幸福效应越小，农民工的年龄越大其社会保险全面性的幸福效应越大，以上与分组分析结果一致。

## 六、结论与评述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加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险作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改善民生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是国民获得幸福感的关键所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利用 2016~2018 年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

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购买社会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购买社会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且购买的社会保险种类越多，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农民工每多购买一种社会保险，其主观幸福感提高 6.10%；五种类型的社会保险均能显著提高参保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相比较于其他类型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大。同时，本研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分样本分析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原模型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并发现与低收入农民工群体相比，高收入农民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受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和全面性影响更大，是否购买社会保险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而老一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受社会保险全面性的影响更大。

以上研究结论肯定了社会保险在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方面的积极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对应的政策建议有：一方面，政府应该通过立法等强制性手段提高社会保险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覆盖面，发挥社会保险在农民工群体中的社会保障作用；由于不同种类社会保险的幸福提升效应不同，可以先从提高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出发，再逐步扩展到其他种类社会保险。另一方面，根据收入水平制定差异化的缴费基数，加大社会保险方面的财政支出，给予低收入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险缴费补贴，提高低收入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险覆盖面。

#### 参考文献

- 1.程名望、贾晓佳、俞宁，2018：《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1978~2015年）：模型与实证》，《管理世界》第10期。
- 2.冯诗杰、李宪、袁正，2014：《医疗保险与城镇老年人幸福感》，《消费经济》第2期。
- 3.胡洪曙、鲁元平，2012：《收入不平等、健康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老龄化背景下的经验证据》，《中国软科学》第11期。
- 4.李后建，2014：《不确定性防范与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基于反事实框架的研究》，《社会》第2期。
- 5.李亚青、吴联灿、申曙光，2012：《企业社会保险福利对农民工流动性的影响——来自广东珠三角地区的证据》，《中国农村经济》第9期。
- 6.刘靖、毛学峰、熊艳艳，2013：《农民工的权益与幸福感——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 7.刘瑜，2015：《社会保障制度的幸福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视角》，《商业经济研究》第6期。
- 8.鲁元平、杨灿明，2013：《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支出偏好与居民幸福感——基于分税制后的中国经验证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第4期。
- 9.罗楚亮，2009：《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财经研究》第11期。
- 10.元寿伟、周少甫，2010：《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公共管理学报》第1期。
- 11.盛光华、张天舒，2015：《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城市问题》第12期。
- 12.王延中、龙玉其、江翠萍、徐强，2016：《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以社会保险为例》，《经济研究》

第2期。

- 13.杨胜利、谢超、杨书华, 2016:《收入、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来自中国家庭收入调查的经验证据》,《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第3期。
- 14.岳经纶、尤泽锋, 2018:《挤压当前还是保障未来:中低收入阶层养老保险幸福效应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
- 15.张映芹、魏鹏, 2010:《幸福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探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3期。
- 16.张子豪、谭燕芝, 2018:《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感》,《金融经济研究》第3期。
- 17.周绍杰、王洪川、苏杨, 2015:《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管理世界》第6期。
- 18.祝仲坤、冷晨昕, 2017:《中国进城农民工的居住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劳动经济研究》第2期。
- 19.祝仲坤、陶建平、冷晨昕, 2019:《迁移与幸福》,《南方经济》第3期。
- 20.A.S.Waterman, 1993, Two Conceptions of Happiness: Contrasts of Personal Expressiveness(Eudaimonia) and hedonic enjoy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 678-691.
- 21.Bjornskov, C. , Dreher, A. And Fischer, J.A.V., 2007, The Bigger The Better? Evidence of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ize on Life Satisfaction around The World, *Public Choice*, 130(3-4): 267-292.
- 22.Blanchflower, David and Andrew Oswald, 2001,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7-8): 1359-1386.
- 23.Clark, Andrew E., Paul Frijters and Michael A. Shields, 2008,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6(1): 95-144.
- 24.Diener, E.D. , 1984,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5: 542-575.
- 25.Easterlin, R.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89-125.
- 26.Easterlin, R. A., Morgan, M. Switek and F. Wang, 2012,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5: 9775-9780.
- 27.Easterlin, R. A. , 2003, Explaining Happines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0(19): 11176-11183.
- 28.Frey, Bruno S. and Alois, Stutzer, 2002,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2): 402-435.
- 29.Graham, C. and Pettinato, S., 2010, Happiness, Markets, and Democracy: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3): 37-268.
- 30.Knight, John, Lina Song and Ramani Gunatilaka, 2009,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4) : 635-649.
- 31.MacKerron, George and Susana, Mourato, 2009, Life Satisfaction and Air Quality in London, *Ecological Economics*, 68(5): 1441-1453.

- 32.Oswald Andrew, 1997, Happi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Economic Journal*, 107(445): 1815 -1831.
- 33.Perneger, Thomas V. , Patricia M. Hudelson and Patrick A. Bovier, 2004, Health and Happiness in Young Swiss Adults,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13(1): 171-178.
- 34.Piet Ouweneel, 2002, Social Security and Well-Being of the Unemployed in 42 Nation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3(2): 167-192.
- 35.Rofman R., Lucchetti L. and Ourens G., 2006, Pension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s of Coverage, *World Bank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No.0616.
- 36.Tella, Rafael Di, Robert MacCulloch and Andrew Oswald , 2001, Preferences ov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Surveys of Happines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1): 335-341.
- 37.Veenhoven, R., 1996, Happy Life Expectancy: A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Quality of Life in Nation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9(1): 1 -58.

(作者单位: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初心)

## **Can the Purchase of Social Insurance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igrant Worke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2942 Migrant Workers in Shanghai**

Cheng Mingwang Hua Hanyang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2942 sample data from the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process conducted by the Shanghai survey team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from 2016 to 2018.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of life satisfa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is article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insurance on migrant work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using an ordered probi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urchase of social insuranc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at the more types of social insurance they purchase, the higher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igrant workers who buy social insurance is 21.70% higher than that of migrant workers who do not buy social insurance. For each additional type of social insurance,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increases by 6.10%. All five types of social insuranc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insured migrant workers respectively, with the highest marginal effect of medical insurance, followed by pension insurance, and the lowest being work injury insurance. Through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and the sub-sample analysis, it finds that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original model have good robustnes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e study proposes thre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ith the purpose of further improv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Social Insurance; Migrant Worker; Subjective Well-being